

中国经济切不能丢弃实业立国

张荣楠

当前扰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主要因素有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以及不及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这一系列问题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 这些问题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 它们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问题? 如果没有梳理清楚上述问题, 就很可能是“盲人摸象”, 也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货币投放过多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到实业循环, 而是流入资产领域, 这恐怕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 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笨猪五国”等一系列危机, 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 “广场协定”之后, 日本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 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 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 落入了所谓的“ 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 GDP 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 宏观政策屡屡失误。为缓解日元升值压力, 日本实行低利率, 把经济资源引导到资产投机和信用扩张, 刺激了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1990

年资产泡沫破裂, 日本当局直到 1995 年才承认经济衰退, 采取措施已晚, 经济泡沫最终破灭。

而至今仍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经济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远大于一、二产业; 而在价值结构上则表现出金融资产不断膨胀, 金融衍生产品是 GDP 的 7 倍左右, 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 GDP 的比例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1.4% 上升到 2007 年的 20.66%。相比较而言, 美国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4% 下降到 2007 年金融危机前的 11.6%, 制造业产出和劳动生产率也长期呈现下滑趋势, 产业空心化所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越来越走向失衡并引爆美国金融危机, 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 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关注的是, 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 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 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 “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2011 年是中国新的“五年计划”的开端, 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岔路口。

从目前看来, 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 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尽管中国的制造业占 GDP 的 48%, 几乎占到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 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遇到瓶颈, 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 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

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 折射的正是温州正在遭遇产业空心化的巨大挑战。温州是私营经济做实业起家的前哨, 拥有全国数一数二的市场意识。然而近年来, 温州技术创新的瓶颈和产业升级压力使得大量实业企业纷纷外迁, 经济空心化的趋势日益严重。温州乃至浙江的投资不足问题非常突出。近十年来, 浙江投资率增速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到 2008 年全国达 57%, 浙江为 44.0%。2009 年全国为 65%, 而浙江仅为 47%。同期, 温州投资率始终徘徊在 31%—37% 之间, 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 13.6 个百分点, 居末位; 投资增速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低 10.6 个百分点, 也居末位。

温州仅仅是一个缩影, 近年来, 由于红利的减少, 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薄, 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 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

资产领域产生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甚至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 它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 就会导致沉淀于工业和农业的大量资金游离出, 流向房地产行业。

2009 年, 全球房地产投资额为 3650 亿美元, 中国的数额为 1562 亿美元, 与上年相比增幅超过一倍, 约占全球的四成。今年 1—10 月份以来全国房地产投资累计达到 45621.96 亿元, 占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4.4%。在增量固定资产投资中, 房地产投资增量占比 31.85%, 贡献近三成。

中国经济的确到了经济转型的“危机时刻”, 中国不缺的是资本, 但中国缺少一种企业家精神、缺少实业报国精神、更缺少创新精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 无论如何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 金融、投资应该建立在强大实业基础之上。未来, 中国应以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来推动产业升级, 实现实体经济的再造, 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强大了才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作者为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焦点评论



ICLONG/图

变卖国企股份补社保

财经漫画

有此一说

经济学家金岩石辞职的启示

周义兴

据媒体报道, 陷入欠债危机和诚信危机的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金岩石, 日前向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递交了辞呈, 国金证券接受了该份辞呈。

作为一位在国内报刊、电视等媒体上频频露面并指点市场的知名经济学家, 金岩石这次辞去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职位, 公众肯定会将之与媒体报道的 10 年前的那起美国债务事件联系起来。

更加重要的是, 此事凸显了投资者对专家学者诚信的关心。因为知名学者有较大社会影响, 所以人们要求他们具备超出一般人的个人品行与操守。就金岩石牵涉到的债务问题, 在具体事件真相彻底浮出水面之前, 人们无法对谁是谁非作出判断。然而, 在微博中, 金岩石称对此纠纷中判赔的“惩罚性罚金不予赔付”, 这一“拒赔”行为是其本人一种对司法裁判真实态度的流露。所以, 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担心: 既然金先生对不合自己认识的美国司法裁判可以不予执行, 那如在国内工作生活, 当国内市场相

关法律法规也不合金先生认识时, 是否也同样会不予遵命? 显然, 这绝不会是一个无端的怀疑。

以知名学者对市场影响讲, 或许不得不承认, 作为一位在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经济学家, 金岩石先生在电视、报刊等公共场合的言行, 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出一般人, 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投资者对市场趋势的判断和投资选择。投资者不能要求金岩石先生的言论精准度, 但投资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其言行是诚实且发自内心的真实判断, 而不能是虚假或有误导性的。如果真如媒体所报道, 金岩石先生 10 年前在美国就有证券债务纠纷, 且被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禁止在证券业从业, 其在回国之后对此有意无意“隐瞒”, 难以让人相信作为一名知名学者其诚信水平是足够的。

当然, 即便是圣人也有过去, 而罪人也应有将来”。金岩石先生就是有再高的知名度, 也有作为常人的一面, 也会犯错。因此在投资者看来, 勇于面对事实, 承认自己曾有的过失, 并敢于承担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 才是对自己, 也是对公众负责任的态度。

经济时评

社保缺口不能仅靠变卖资产来弥补

余丰慧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 全国国有资产规模超过 40 万亿元, 却不缴或很少向国家缴纳利润。应该加速国有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资产的社会化, 变卖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 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 改善收入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说,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性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角, 成为改革收入分配的难点、焦点问题所在。周天勇教授介绍的一组数据是有力佐证: 国有企业从 1997 年到 2007 年没有上缴利润, 后来上缴的比例也很低。当前国有资产达 40 多万亿元, 就业数只有 2000 多万人。40 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 这是不合适的。”并且, 国有金融企业上缴利润一事还没进行讨论。

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中央政府竭力倡导和要求的。如何遏制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国有金融企业独享国企成果, 特别是遏制其高管人员的离谱高薪, 是当前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专家学者们都在探索、研究如何让全民享受国企发展成果的问题。周天勇教授建议, 应该加速国有工商企业和金融企业资产的社会化, 变卖一部分国有企业资产来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思路, 虽然报道中没有详细说明其道理, 但是, 相信周教授自有其充足理由。打破国企垄断地位, 实现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国有金融企业资产社会化, 使其与其他形式的企业平起平坐展开竞争, 不仅有利于分配制度改革, 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但是, 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长远目标, “远水”解决的是根本问题, “近渴”

还需立竿见影的“近水”来解。一个现实有效的措施就是大幅度提高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上缴利润比例, 这些利润专项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11 月初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研究决定, 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目前, 全国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至少在几万亿元。2009 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 8151 亿元, 从 2006 年到 2009 年 4 年间上缴国家财政利润仅 1371 亿元, 平均每年上缴利润 342.75 亿元, 占 2009 年全年利润总额的 4.2%。经此计算, 看来央企利润上缴国家连个走形式都走得很不光彩。假如央企利润上缴国家比例提高到 30%, 那么按照 2009 年央企利润计算, 将要上缴国家利润达到 2445.3 亿元, 如果全部填补社保资金的话, 五年不到将填补万亿社保资金缺口。

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金

融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增加后肯定会影响到资金的供应, 怎么办呢? 一边上缴利润增加, 另一边就要求大幅度减少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薪酬福利等过高收入, 特别是一定要把国企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离谱高薪、高福利、高职务消费“三高”降下来。将降下来的“三高”资金用于补充企业发展资金之需。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分配改革之重要内容。

国企本身就是全民所有, 是人民的企业、老百姓的企业。通过国企上缴利润补充社保资金形式让全民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让民众感受到国企与自己是有关系的, 这有利于消除国企与老百姓之间的对立情绪, 反过来也给国企创造一个发展的良好群众基础、舆论氛围和社会和谐环境。从根本上来说, 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鹏 眼

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含金量

黄小鹏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备受老百姓关注, 但人们又对其非常不满意。从经济学圈到老百姓, 围绕中国有没有经济学家, 谁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争论不休。香港的丁学良教授宣称, 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此论一出, 舆论沸腾, 甚至有更极端的人认为, 中国一个经济学家也没有。

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做出如此低劣的评价, 部分是出于道德标准, 是对许多经济学家依附权贵, 为强势利益集团代言的不满和不屑。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这一群体专业能力的不信任, 有人以西方标准来衡量, 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在基础理论上无创见, 有人则对某些经济学家不断做出离谱的形势判断, 屡屡开出雷人的对策方案感到极度失望。

其实, 在我看来,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经济学家已经到退出中心舞台的时候了, 该登场的应该是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经过 30 年的改革, 市场经济常识已经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 大到宏观调控、小到市场体系建设、小到企业微观经营, 基本概念和运作已为全国人民熟知。当然, 经济学家该退出中心舞台, 绝不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完善, 恰恰相反, 是因为今天市场经济完善出现僵局, 如何建成法制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其议题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经济学科的范围。

不过, 话虽如此, 在很多具体经济问题上, 经济学家还是可以发挥一技之长, 造福国家和人民的。经济学家有没有社会价值, 就看他有没有对现实问题提供接近事实的常识性解释。眼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而通胀从来就是宏观经济学最主要内容之一, 是一个绝佳的试金石。我们不妨挑几个概念或命题来试一试他们。

第一个命题是“物价上涨不是通胀”。这里所说的物价, 不是单指猪肉、大蒜或白菜, 也不是单指衣服、鞋帽、汽车和飞机票, 如果说上述这些商品和服务单个的上涨不是通胀, 那等于脱裤子放屁, 只是一句正确的废话。这里的物价显然指的是物价指数, 即 CPI。

从语义学上说, 膨胀指的就是某种东西多了, 通货膨胀就是指货币多了。假如货币比实体经济所需的多了 1%, 那么, 物价指数就上涨 1%, 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如果货币不够实体经济所用, 那么就会发生通货紧缩。

但是, 把货币量控制在刚刚符合实体经济所需的水平, 即物价指数涨幅为零, 这几乎做不到, 也完全没有必要。现今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实行一种称之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制度, 即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央行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接近但低于 2%(或 3%)的水平。显然, 在这种制度框架下, 2%或 3%被认为是一个安全的通胀水平, 假如认为 2%或 3%的 CPI 上涨幅度不是通胀的话, 那“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个概念岂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由此可见, 世界各国对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和定义没有任何模糊之处。通胀从幅度上看有安全、可接受和不安全、需要抑制两种情况, 但任何 CPI 大于零的情况, 都定义为通货膨胀, 小于零的情况都定义为通货紧缩或负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标准的表述。媒体在报道每个月的 CPI 数字时, 甚至直接



说通胀率多少, 而不说 CPI 涨幅多少, 对于负的 CPI 涨幅, 也经常表述为通胀率为负的多少(如通胀率 -0.5%、-1%、-2%)。不知那些口口声声称“当前的物价上涨不是通货膨胀”的人, 是从何处得来的灵感。

第二个概念是“全面物价上涨”。按理说, 物价上涨只能分为单个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和价格指数的上涨, 何来“全面物价上涨”之说? 难道还有“局部物价上涨”之说?

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品种成千上万, 列入 CPI 统计范围的也有 8 大类 262 个 small, 具体商品成千上万, 这些商品价格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 但成千上万种商品全部都处于上涨过程的局面恐怕是从未有过的。既然“全面物价上涨”从未出现过, 大概在持此论者看来, 通胀永远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了, 也永远犯不着防通胀和治通胀了。通货膨胀一词完全可以以从辞典里、从教科书中、从政府的议程中消失了。

笔者不揣冒昧地推测, 那些动辄所谓“当前物价上涨不是通胀”、“物价没有全面上涨”的人所想的恐怕是: 物价还没有到螺旋式上升阶段, 老百姓还能承受得起。他们对通胀发生机理所知了了, 始终不承认通胀这个词, 也始终鼓吹老百姓忍受, 始终幻想利用通胀来推动 GDP 增长。

第三个概念是“结构性通胀”。“结构性通胀”一词是近几年才开始在市面上流行的, 由于无人声称对此拥有专利, 它的发明者已无从查考。既然 CPI 是一个指数, 是成百上千种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 由于几乎不可能出现所有商品同方向、同幅度变化的情况, 单个商品价格总是呈结构性涨跌,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指数来衡量总体变化情况。通胀是指总体物价上涨, 通缩指总体物价的下跌, 这里已经抽象掉了 CPI 篮子里的各种变化组合, 因此, 用“结构性”作“通胀”的定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和语义矛盾, 如同说“圆的正方形”一样荒唐可笑。

当然, 这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把指数拆解开来进行更深层的分析, 但这种拆解只在作中期预测时才有意义, 就政策原则而言, 分拆无任何意义。因为, 对于老百姓来说 CPI 3%就是货币总体购买力下降了 3%, CPI 5%就是下降 5%, 与单个商品涨跌幅无关。

笔者再次不揣冒昧地推测, 那些胡诌结构性通胀一词的人恐怕是“核心通胀”概念的信徒。不过, 他们或有不知, 核心通胀概念在西方曾误导决策, 导致通胀失控。目前, 实施通胀目标制框架的国家绝大多数以总体通胀为目标。更重要的是, 他们顾中国国情, 不顾食品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业过热、总需求过旺和工农业部门生产率差异的事实, 他们的药方总是回避宏观对策。这种思路在过往三轮通胀中都遭遇失败, 现在如果仍执迷于所谓结构性通胀,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